

中国当代秘书学家论

ZHONGGUO DANGDAI MISHU XUEJIA LUN

邱惠德 著

2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秘书学家论

邱惠德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特约编辑:许子清

责任编辑:郑永

封面设计:陆平

中国当代秘书学家论

邱惠德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 北碚)

重庆市科委情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125 字数:228千

1998年3月 第1版 1998年3月 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5621-1892-2/D·72

定价:20.0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第一部秘书学评论专著。它对当代有成就、有代表性的15位秘书学家进行了评论,肯定了他们十多年来在秘书学开创时期的探索与贡献,也对其问题与不足进行了剖析。全书从一个侧面
对当代秘书科学的发展进行了理性探讨,从中可以认识其大致走向。

序 言

秘书工作源远流长,秘书学却是一门年青的新兴学科。在我国,当代秘书学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提出的要求,为当代秘书学的诞生提供了客观必然性。1980年复旦大学分校(现上海大学文学院)首先建立秘书专业,1982年2月18日《光明日报》载文提出建设新兴的边缘学科“秘书学”。一大批有志之士投身到这一拓荒性的事业中来,秘书学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秘书学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建设秘书学,需要学术界和秘书界的通力合作。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在秘书学科建设上作出重大贡献的,是高等学校从事秘书学教学、研究的教师和在秘书岗位上实践并善于从经验上升到理论的“行家”。正是这两支力量发挥各自独有的优势而又能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协力攻关,才使秘书学走向独立并逐步完善。令人欣喜的是:现在秘书学科已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学术带头人,一批卓有成就的秘书学家,出版了多种有份量且产生广泛影响的著作,全国已有二百余所各类高等学校设立了秘书专业或秘书系,秘书学研究正向深度发展,它将以社会科学中一门新兴学科跨入21世纪。

80年代初,我曾涉足秘书学领域,主持南京大学秘书专业的教学工作,主编过《公文写作概论》,参加过1984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高等院校秘书学教学经验交流会,和秘书学界的朋友有

较多的交往。80年代后期,因工作需要,受命主持新闻专业教学工作,研究工作也转向新闻传播领域,但我仍关注着秘书学建设的进展,朋友们也常把秘书学新著寄给我,让我先读为快。这一回,重庆商学院的邱惠德同志把他的新著《中国当代秘书学家论》书稿寄给我,并盛情嘱我为之作“序”。我怀着学习的心情读了书稿,仿佛又见到了几位熟悉的老朋友,结识了一批新朋友,从他们的见解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也从邱惠德同志的评论中,看到他的学者的胆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这本新著第一次从理论上比较系统地对十五位秘书学家的成就作了总结和评论。通过评论,审视了我国秘书学15年来在理论建设上的主要成就与不足,把一批在学科建设中经过艰苦探索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介绍给学术界和社会,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我国秘书学的大致走向。在我看来,这是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专著,其学术价值与对秘书学建设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的。具体地说,我感受较深的是下列四个方面:

一是谨慎地选择评论对象。秘书学界有贡献的专家、学者甚多,就我所知就不少于数十人。邱惠德同志在一本书中不可能都作评述,便选了这十五人。他是通过多年搜集、积累资料,并精细研读后才谨慎地确定下来的。看来,他既坚持了以学术论著对秘书学建设所作的贡献为标准选择对象,又注意到所评对象的代表性。从年龄层次看,既选了“开我国秘书学研究之风”的李欣以及王千弓、常崇宜等公认的老一辈专家,更注重选评在学科建设中起中坚作用的董继超、方国雄、杨剑宇、侯磊、刘耀国等中年学者,对王守福、史玉娇等有贡献的青年学者也给予论评。从工作岗位来看,既有在中央办公厅、省市办公厅工作过的李欣、侯磊、周治辅、黄桐华、任群等,也有在基层工作过的董汉庭等,对在高校从事秘书学教学和研究作出过贡献的王千弓、常崇宜、董继超、方国雄、杨剑宇、楼宇生、刘耀国等,亦都作了评论。特别是对军队的秘书学建设亦能加

以重视,评论了青年学者王守福。这样一个名单,虽不免有“遗珠之憾”,但总的来说,已包含了方方面面,能全面反映出15年来秘书学理论发展的总体概貌。

二是坚持实事求是的评论原则。我国的秘书学还处于幼年的成长期,要使它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对已取得的成就的评价要恰如其分,不宜说得太“满”。令人高兴的是:邱惠德同志在评述过程中,能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既热情肯定了被评者的学术成就,也坦率地指出其不足之处和存在的问题,即使是对李欣、常崇宜、董继超、方国雄等的著作,也不留情面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样“有好说好,有差道差”,客观公正的态度,值得充分肯定。全书贯串着一种学术探讨的精神,著者对一些众说纷纭的问题,能从学科建设的高度进行理性的思考,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评论过程中,也显示了他秘书学方面的造诣和功力。

三是能抓住特点、准确定位。每位秘书学家,都对学科建设作过贡献,但又各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有自己的“个性”。邱惠德同志在深入钻研被评对象的著述后,能把握住其独特的贡献,从宏观上给以准确定位。如对李欣,突出其作为学术带头人的基本学术观点的价值与影响;对王千弓,突出其对学术方向的导航作用;对常崇宜,突出其在秘书活动和学术研究上的默默奉献精神;对董继超,突出其对基础理论与秘书教育的探索;对方国雄,突出其丰厚的著述和探求中表现出来的才华;对杨剑宇,强调了他对历史秘书学的探讨和成就;对侯磊,强调了他对秘书信息理论的贡献……,这样抓住每个人的个性特点进行评论,既使全书成为一个整体,能体现秘书学理论建设的全貌,又避免了前后重复,从中可以看出著者的匠心。

四是内容扎实,文笔流畅,可读性强。全书评论的十五位秘书学家都有丰厚的著述。要将被评对象上百万字甚至数百万字的著

作，用几千字、一万多字作出全面而精到的论评，确属不易，而邱惠德同志做到了。可以看出，著者在理清头绪作出理论概括上下了很大力气。另外，全书文笔流畅，且针对不同对象以变化的笔墨进行评论，避免了一般评论文字呆板、艰涩的毛病，读起来饶有兴味，可以看出著者较深厚的文字功底。

我和邱惠德同志并不相识，是由于董继超同志的介绍，才发生了联系。读他的书稿，可以想其为人。这是一位踏踏实实做学问、勤勤恳恳教书育人的高校教师，一位基础厚实有独到见解的秘书学者，一位刻苦勤奋、正直坦诚的知识分子。他写这本书，从搜集材料到写完最后一篇，整整用了7年时间。这种崇真务实、不懈探求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尽管这本书和秘书学科所达到的高度一样，并非尽善尽美，我仍乐意为之作序。我相信，邱惠德同志会在完成这本著作以后，继续努力，写出一本“当代秘书学史”来，并在秘书理论的探索上不断作出新的贡献。我期待着他下一部新著的问世。

裴星生

1998年3月7日

写于南京大学北阴阳营宿舍

目 录

序 言.....	(1)
----------	-----

第 一 辑

一. 开神州当代秘书学研究之风的人 ——论秘书学家李欣.....	(1)
二. 勇攀“世界屋脊”的秘书学家 ——论王千弓	(32)
三. 但开风气不为先 ——论秘书学家常崇宜	(60)
四. 十年辛苦不寻常 ——论秘书学家董继超	(81)
五. 十年冷板凳 论著冠秘坛 ——论秘书学家方国雄.....	(109)
六. 崎岖山道上拉着牛车前进 ——论秘书学家杨剑宇.....	(138)

第 二 辑

七. 在此,他留下了深深的脚印 ——论秘书信息专家侯磊.....	(165)
-------------------------------------	-------

八. 实践家的理论 理论家的实践	
——论周治辅的秘书活动·····	(184)
九. 长期实践的积淀 不断探索的收获	
——论任群和《秘书理论与实践》·····	(198)
十. 论黄桐华和广西的秘书学研究·····	(209)
十一. 舍弃“官道”走“学道”	
——论董汉庭·····	(219)

第三辑

十二. 从“学生”到秘书学家	
——论楼宇生·····	(229)
十三. 严谨·深刻·求是·创新	
——论刘耀国并兼及《秘书》杂志·····	(242)
十四. 由普通一兵到秘书学专家	
——论王守福·····	(254)
十五. “小桥外新绿溅溅”	
——论史玉娇·····	(265)
后记·····	(275)

开神州当代秘书学研究之风的人

——论秘书学家李欣

虽然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1949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过李剑飞的《关于机关文书工作研究》,虽然1956年广东省委办公厅创办了名为《秘书工作》的内部刊物,历时两载余,总结秘书工作经验;虽然1958年于哈尔滨之夏,黑龙江省召开过讨论秘书工作特点的670多人的会议,但开神州当代秘书学研究之风的第一人,是李欣!

因为,李文仅涉及到文书工作,广东《秘书工作》基本上停留在介绍动态、总结经验上,哈尔滨会议接触到了一些实质问题,也仅仅是一个良好开端,均未形成大的学术气候;李欣则不然!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他“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于1959年开始“对秘书活动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着手写作《秘书工作》专著,1961年完成了全书的初稿,1963年印出了样书,征求意见,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讲授书稿中的大部分篇章。”其书“实为我国当代秘书科学论著中的开拓之作。”^①

不仅如此,李欣的一生与秘书工作,与秘书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自13岁参加革命起,他就从事文书抄写工作,从解放战争直至离休均从事秘书工作,又正值而立之年开始了他的研究生涯,所著甚丰,影响甚广。

这便是提起当代中国秘书学研究,便无法回避李欣及其学术

与学术活动的缘由所在。

一．艰苦的求索之路

很难想象，仅有初小三年级学历的人，能在中办秘书局这高知识、高智能密集之所，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担任常务副局长、正局级调研员、杂志主编并被国家评为编审；李欣正是走过了这样的道路的人！

1943年，残暴成性的日寇大扫荡时，把李欣家乡山东陵县的一切，包括小学都扫了，荡了。失学后，13岁的李欣找到了八路军，参加了革命。当时他也算是一名小有知识的人了，在部队既当宣传员，又从事抄资料的工作。以后，由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由地方部队到野战军，由潍坊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到渡江战役，由进南京伪总统府到驻上海市高楼大厦，随着那一时代中华民族历尽坎坷，以及共和国诞生前所受的阵痛与磨难，种种苦罹，他都曾承受过。这期间，他先学习机要译电技术，并长期在机要科工作。那时的机要科，就是秘书部门。

到了上海后，李欣转业到了地方，在华东局做秘书工作。这时，单位来了不少年轻的大学生。通过接触后，他们不仅敬佩年轻的李欣不凡的革命经历，而且推崇他的写作能力和中西文化知识。何以如此？

原来，在那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于繁忙的革命工作之余，李欣硬是挤出时间，凭着一本小小字典，如饥似渴地读遍了所能找到的中外名家名著：《论语》、《史记》、《唐诗三百首》……，莎士比亚、雨果、契诃夫……。悬梁刺股的精神激励着他，尽管常常熬红了双眼，熬瘦了柴骨；然而，名人名作甘甜的乳汁不仅使他精神世界丰富了许多，而且他的写作能力也得到了培养。大学生们的崇拜并未使他

沾沾自喜，他知道自己自然科学知识和数学的苍白。以后，他常常学习到深夜一、两点钟。

华东局撤销后，他到了北京党中央机要室（现今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前身），任值班秘书。工作之余，他集中精力钻研中国古代史。也就在这时候，他接触到了中国古代秘书工作和秘书人物。齐太史的忠于职守，阮瑀的文不加点，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他又到北大听课，进一步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史。1959年，办业务展览时，李欣偶然接触到了前苏联文书立卷的书和许同莘的《公牍学史》，灵机一动，遂冒出了火花：产生了为什么不写写自己工作的意念。于是，在有关领导和同事的支持下，走访老革命、查询有关资料、深入实地考察，历经寒暑，历时数载，他写出了厚厚一本书稿，并于1963年印出了名为《文书工作》的样书200本。

这偶然的结晶，实则是“李欣历史”的必然！如果没有现代文明之光的召引，如果没有凿壁借光的求索精神，如果没有无数偶然，就没有这必然！难怪80年代初，为自学成才者立传高潮时，曾有人试图将李欣作为典型予以介绍，这不无道理！

二．植根于实践的学术探索与成就

不知是历史的遗憾，还是好事要多磨。

《文书工作》中有关《中国历代秘书工作点滴》等两章写出后，由于对一些问题把握不准，李欣分别将其函寄郭沫若和范文澜，向二老请教。郭老回函，在指点个别问题后，给予亲切鼓励。当时，中办副主任田家英读到样书后，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尤其对“历代秘书工作点滴”和“革命战争年代的秘书工作”两章赞不绝口，认为：“填补了过去没有研究的区域。”这给年轻的李欣注入了活力。

正当他准备进一步深入研究下去,完善该著时;那场“史无前例”革“文化”的命的运动,将绝大部分样书毁之一炬。李欣也莫名其妙地被扣上一顶“学术权威”帽子,所受种种不公待遇就可想而知了。

历史终于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新时期政治经济的大发展,对秘书人员的大量需求,大大刺激了高校建办秘书专业的活力。研究秘书学,撰文出书,已成热潮。曾被迫熄灭了研究之火的李欣,又烧燃起了探索之光,是事之必然!当有人重新拿出劫后余存的两册《文书工作》时,他补写了《总论》和《秘书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等章节后,基本按原书正式以《秘书工作》书名出版。该书成为新时期首批秘书学著作中“一本极有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的力作。”^②从此翻开了李欣在秘书科学研究道路上新的篇章。

研究者在论述我国当代秘书学的诞生时,均断言为80年代初期。根据是,大学办起了秘书专业,秘书学论著和刊物出版,秘书学会纷纷诞生,这当然不错。然而,任何事物的产生不可能一下子从天而降,没有十月怀胎,就不可能一下生产出婴儿来;没有本文开头提到的50年代对秘书现象的初步探索,特别是李欣的系统研究,很难断言80年代“秘书婴儿”会一下子呱呱坠地。因此,对上说应加以完善:我国当代秘书学孕育于本世纪50年代中、后期,正式诞生于80年代初。这样才符合客观实际,也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十多年来,李欣潜心于秘书学研究,发表论文50余篇,由他主笔撰写的专著除《秘书工作》外,尚有《中国现代秘书工作概论》、《中国现代秘书工作基础》(以下简称《基础》)、《秘书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③,他主编的有《办公室工作规范》、《例释中国现代公文体式大全》、《中国秘书发展史》、《办公室工作实用全书》、《公务文书写作概述》、《乡镇秘书》等多种,总计约400余万字^④。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这在秘书学研究队伍中是不

多见的。这些论著不仅涉及到历史秘书学、应用秘书学,而且涉及到理论秘书学。他的很多学术观点为学界公认,他的不少著述在实践中起着指导作用,影响十分广泛。

这里还必须说明的是,李欣任主编的书,从拟写题纲到最后定稿审核,他都认真把关,而且亲笔撰写某些章节、段落,真正起到了主编的作用,与现在某些“主编不编”现象不可同日而语。这更弥足可贵。

纵观李欣的学术研究,其突出特色是,他的理论是植根于他长期丰富的秘书活动实践的,但又不完全囿于自身的工作经验。他长期注重文化修养的提高,注重理论学习,一经发现自身的活动具有研究价值,便取得领导的支持,同行的帮助,并查询资料,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作调查研究。这样加工提炼出来的理论,既摆脱了个体单纯经验总结的局限,也防止了应用学科脱离实践的空洞理论的产生。应该说,李欣找准了自身的优势,所以在学术研究道路上他取得了应有的成功。

当90年代初刘耀国、方国雄二位先生著文肯定李欣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时^⑤,有人否定李欣有学术思想,认为他顶多是经验的总结而已。针对分歧,杨剑宇先生撰文客观、冷静地从两个层次讨论了问题的实质,并告诫学术界不要重蹈当年公共关系学的“自我否定现象”的覆辙,指出:“由于李欣同志是在中办秘书局秘书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开始其学术研究的,因此,他的秘书思想是中办秘书局,乃至中办、国办全体同志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他则是这一结晶的代表人物。”^⑥论者这一结论,客观公正,一语中的。

正因为如此,也有人认为李欣的观点仅适合于高层党政机关,而不适宜于基层和其它行业的秘书工作。这一评论既有一定道理,也不无偏颇之处。须知,作为秘书工作,古今中外,高中低各层次,总有其共性,比如,它处于从属、辅助地位,它无权决策,仅有参谋、办事职能,必须为政务、事务服务,等等;只不过时代不同、层次不

同、行业不同、所表现出来的强弱轻重不同而已。因此，李欣的许多理论观点具有普遍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李欣基于自己长期的秘书工作经验，并有机会了解到我国秘书工作的全局动态，以及最高层对此的有关方针，他在作深入探索、理论抽象时，总是以此为依循。他的学术研究主要成就，我们可以概括为：形成了十大观点，构成了两大体系，迈过了三大台阶的研究、求索道路。

十大观点——当代秘书学重要理论的组成部分

李欣在总结秘书工作经验，探索规律，进行综合概括时，逐渐形成了一些重要理论观点，对当代秘书学不仅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是其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这些理论观点是：

（一）“三办”，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

1985年1月，中央办公厅座谈会报告中，在指出秘书工作要实现“四个转变”时，已经提出了“办文”“办事”的概念，作为报告的撰稿人之一，李欣对此十分清楚。但此前后，人们对秘书的重要职能职责认识并不统一，也未作出抽象概括，作为秘书工作的任务来规范秘书行为，以致长期误用50年代中央针对秘书长工作性质的“既要参与政务，又要掌管事务”的规定。理论指导的失误，导致了实践指导和学校培养秘书的偏差，在学术界也引起了分歧和争论，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1985年11月在武汉召开的全国高校秘书教学研究会上，李欣正式提出了“三办”，即“办文、办会、办事”的概念，认为这是秘书的基本职能。这一提法为秘书学界认同，以后在论文和著作中，作为一般概念，常为人们使用。1987年成都会议上，李欣具体指出：“办事有查办、办文、办会、办信、办机要交通、办

电话、值班等等。”^⑦不久，他又进一步说：“这一系列，已构成了一个体系，构成运转机制。”^⑧由此可见，他对“三办”的高度评价。以致 90 年代后他还说：“秘书工作最大量、最经常、最基础的工作还是文书处理、会务管理、日常办事。这些工作直接关系、影响、甚至左右领导工作运转效率。”^⑨他告诫秘书学界不要冷落了对此的深入研究，在具体工作中也不要放松“三办”的常规操作训练。

“三办”，也是秘书工作职能职责和任务历史的高度概括。如人所知，公务文书的产生与秘书工作与生俱来，因而办文从来就是秘书的最基本职责。原始社会，会议是发扬民主的重要方式，随着社会的前进，会议成为了议事决策的手段；现代社会，会议已成为领导工作不可缺少的管理方法；为开好会，会前、会中、会后有一系列事务工作要做，因而，办会就理所当然地成了秘书人员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统治者（领导）之所以设置秘书，就是要他为自己的工作提供事务服务，以减轻繁杂琐事的纠缠，集中精力抓好主要工作，不办事的秘书是不存在的。所以，秘书人员与“三办”自古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同时，把秘书工作的基本职责与任务规定为“三办”，不仅对纠正秘书要“参与政务，管理事务”，这一不切实际的错误主张提供了替代的客观理论概括，而且使秘书工作基本职责具体化，并在理论观点上指导秘书人员更加明确自己的主要工作任务，丢掉不切实际的想法，搞好本职工作，均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所以，“三办”这一概括提法，对于规范秘书行为，端正其工作态度，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

（二）秘书不能“参与决策”的观点，理论上廓清了是非界限，实践上使秘书明确了自己的层次地位。

秘书参谋职能的响亮提出后，一些人强调过头，在秘书“参与政务”这一不确切的口号启示下，提出了秘书“参与决策”的命题。一时间秘书学著作和文论中，纷纷使用这一提法，以致在理论和实